

第一卷 姓“资”姓“社”
问三年

一、1990：“两问”奇文初登台

1990年2月22日某报发表一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对改革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进入90年代较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市场化”、“股份制”、“购买国营企业”、“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贷款”等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民间议论纷纷。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有人对于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产生了疑问。有人说：“出国留学的政策要变动。海外学子纷纷流传说：‘回国探亲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地审，一回国就出不来了。’”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其实早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左”的东西就已经抬头了。

民间议论纷纷。

有人说：“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有人建议恢复“五七”干校，有人说知识分子还应当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

有人对于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产生了疑问。

有人说，出国留学的政策要变动。

海外学子纷纷流传说：“国内发生了六四风波，回国探亲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地审，一回国就出不来了。”

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

这些是老百姓的议论。

或是不了解全面情况听信传言，或是认识糊涂，这些都不难办。各种媒介发表一些有针对性的言论和报道，做做思想工作，再加上形势发展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就可以大体解决。事实上，群众当中的这些疑虑正是这样澄清的。

但是某些“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左”的声音就不这么简单了。

他们的言论出于自觉有备而来，远比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深刻”得多。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认识，决不是做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恰正相反，他们是处心积虑地用想“左”的一套来阻碍改革开放，恢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套。

1990年2月22日，某大报发表一篇很有来头颇具权威性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文章引用了一些逃亡海外的人呼唤和赞扬中国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的话，告诉读者：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

这篇文章还对改革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进入90年代较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

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的是什么呢？

文章说：“他们指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说：“有的主张把国有资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给私人，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有的主张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加紧输血，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

好家伙，“私有化”、“市场化”、“股份制”、“购买国营企业”、“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贷款”等等，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大帽子，在当时的形势下谁受得了？

某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

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文章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该杂志同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把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概括为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岂不是又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吗？

1990年6月11日，某大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一文。

文章对支持民营和个体企业发展的人进行了指责，说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1990年7月30日，某大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讲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了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巨大勇气。

《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一文的作者明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说：“‘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

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在文章中 自以为对社会主义十分清楚的作者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 第一条主要内容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那么 人们不禁要问 ,1997 年 党的十五大确认：“非公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并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十五大这些决定对不对呢？十五大之后我们国家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今天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谁说》一文的作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二者必居其一。

假如是自己还没搞清楚 就蛮横地批判别人“不清楚”那么 这除了是扣帽子、打棍子之外 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这一点，极左思潮还有更多的表演。

二、1991 邓小平春节放言

国内外局势造成的惶惑不安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改革开放不大人提了。发展速度缓缓地在 5%左右徘徊。邓小平对此感到十分焦虑。 1990 年 3 月 3 日邓小平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 如果长期这样 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 也叫滑坡了。”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 就那么自由 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说 1990 年的中国报刊出现“社会主义热”并不过分。

看看主要报刊一篇接一篇粗黑的大字标题：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 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青年》…

这样密集地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是几十年以来所少见的。

一个名叫闻迪的人所写的 4 万字理论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某大报上从 1

月 15 日到 19 日整整连载 5 天，打破了几十年来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记录。

当然，这是总结八九风波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措施。针对八九风波中有人公开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对共产党领导的否定 这些文章中 有些是写得不错的 有说服力。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的人就利用这些文章，一阵紧一阵地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

一些文章，所发表的讲话，露出尖利的钉子，威胁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些文章和讲话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极左私货，以恐吓读者和阻碍改革开放为能事。

也真凑巧，就在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

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每一天都传来令人震惊的巨变消息。从 3 月 11 日到 10 月 25 日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兹别克等 11 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 退出苏联。在 11 月 7 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前面，俄罗斯三色旗和苏联红旗打作一团，有人当场把苏联国旗付之一炬……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

在沉默中 有些人暗中说 北京应该挑起领头的重担 重新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国内外局势造成的惶惑不安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改革开放不大人提了。在有些单位里，谁要是坚持提改革开放，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整个的气氛沉闷压抑。

不管上级下级，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对口径。

发展速度仍然缓缓地在 5% 左右徘徊。

邓小平对此感到十分焦虑。1990 年 3 月 3 日 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对于全国都很关注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表示了冷静观察的态度。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他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 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 包括政治关系 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重点还是国内问题。邓小平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 如果长期这样 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 也叫滑坡了。”

这里的‘担心’表现了邓小平的忧虑。

邓小平特别提醒要抓住机遇，并且提出了要抓上海带全国。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更好，可以更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 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 年 12 月 24 日 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告诫 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 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 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 邓小平针对国内刚刚掀起的问一问姓‘社’姓‘资’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头，发表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都会留下印记的突破性意见。

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 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 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 是自甘落后。”

这些话，同一年之后南方谈话的精神相一致。在南方谈话中，这些意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这些年，邓小平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到上海过冬。

1991 年初 邓小平来到上海。

深圳、珠海等地的飞跃发展和上海的相对滞后使邓小平感慨万千。

上海 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 是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最高的沿海特大都市；

上海 是中国开放最早 开放程度最大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 被世界认为是“东方的巴黎”在二三十年代 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大亨、政治家都来上海寻求灵感和发展 就像今天他们去纽约、巴黎一样；

上海，曾经是亚洲自由兑换货币的金融中心，曾经长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

.....

如今的上海 显得老了 旧了 破败了。一千多万不甘落后、心怀期待与焦急的上海人民 双眼注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心里何尝不焦急？

1991 年 1 月 28 日到 2 月 18 日 邓小平在上海视察 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邓小平遗憾地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 要努力干啊！”

他回忆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 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邓小平后悔地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 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 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向前展望说：“开发浦东 这个影响就大了 不只是浦东的问题 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 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 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 今后也要这样搞。”

针对“左”的势力抬头 改革开放声音微弱的情况 邓小平要求：“改革开放还要讲”。

邓小平对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很不以为然 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有许多人不同意 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嘴里不说 心里想不通 行动上就拖 有的顶了两年 我们等待。”

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不是那么回事 两者都是手段 市场也

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坚决支持上海打破封闭意识 他说：“发展经济 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 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 他说：“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个 才能开拓新路。”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更大一点 步子更快一点。”

有些人说 因为北京报刊上开始问姓‘社’姓‘资’ 改革开放的声音受到压制 所以邓小平到上海来发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讲话，当然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他的声音，通过一个奇特的新名字皇甫平传向全国。但是，却引起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

三、1991 皇甫平宏文四论

1991年初，一些报刊仍然起劲地在鼓动问一问姓‘社’姓‘资’。2月15日 正是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新的一年是羊年。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 题目是《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事后得知 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是也，取其谐音而得皇甫平。文章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文章的要言在这一段：“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2月15日，正是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新的一年是羊年。

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题目就与一段时间以来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对比：《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事后得知，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是也，取其谐音而得皇甫平。

这篇不长的评论 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 鼓动改革。

文章说：

12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谁能忘记，当我们党吹响改革第一声号角之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疮痍满目，百废待举。那时节 衣袋里藏着欠债单走上前线的农家子弟 何止一个“梁三喜” 抡起 18磅大锤敲敲打打造机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工业？12年春风秋雨，12年改革

开放 今天 当我们步入又一个羊年之际 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四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来缠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抚今忆昔 历史雄辩地证明 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 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到下一个羊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进了 21 世纪 实现了小康目标 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安居乐业 丰衣足食”已成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跨进辛未羊年 我们的改革步伐 无疑要比前一个 12 年更快 我们的开放幅度 无疑要比前一个 12 年更大!

60 年一个“甲子”。我们回顾历史 前一个辛未羊年——1931 年 正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 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 饱蘸着中国人民多少血泪和屈辱 腐败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 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在今昔历史的对比中 又是多么地明晰深刻 我们展望未来 下一个辛未羊年——2051 年,又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光辉时刻。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4000 美元 这将使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综合国力走在世界前列。从根本上说来 当今生产力的大发展 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大大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要实现这个光辉的目标 需要 60 年整整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这 60 年,必然是中国人民不断改革、探索、开拓创新的 60 年 是不断扩大开放的 60 年。总之 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光彩的一个“甲子”!

从辛未羊年开始 今后的十年 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十年 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十年。十年看头年 辛未羊年 对于上海来说 应该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 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 总揽全局 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我们的各级干部 要以改革的姿态 振奋精神 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政治民主观念 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全民共识 造就崭新的改革开放舆论环境!

今天我们读着这些话,已经耳熟能详不新鲜了。可在当时,这些话是十分刺激的。尽管这篇文章照顾到当时舆论接受程度 没有提“市场经济”而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说法 但是 文章中所鼓动的“改革年”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以及“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还是刺激了一些人。

为什么呢?

这就要稍微分析一下 问一问姓‘社’姓‘资’。

这句话表面上是“问一问”好像是问句 实际上已经给你答案 这就是改革开放姓“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公开地站出来反对这一方针是很困难的。于是有些人绕个弯 在表面上他不否定改革开放这四个字 但他在“怎样改”上做文章。你真的一改 比如搞包产到户、搞股票市场、搞市场经济、搞股份制等等，他就说你是搞资本主义，结果还是让你改不了。所以，归结到根本上，这些人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所谓问一问姓“社”姓“资”，不过是一句借口 是表面文章。如果你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因为搞不明白而在发问，那不过是上了当而已。

正因为如此 有些人一听到真诚地赞扬和鼓动改革开放 就本能地反感 甚至神经过敏。

何况 在这篇文章中 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在中国，有人看了小说要对号入座，有人看了报告文学要对号入座，有人看了理论文章也要对号入座。在提倡“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人看来 这句话正是针对他们说的。

然而 真诚希望推动改革的人 读到了这篇文章 特别是“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这句精辟的概括 如同大旱之盼甘霖一样地欣喜：“久违了 改革开放！”

新出现的皇甫平 引起了注意。

皇甫平再接再厉。

《解放日报》3月2日再发表皇甫平的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这篇文章要求：“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 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 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文章提出，90年代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国企改革中，简单地套用过去的老框框不行，被书本束缚住也不行。要有新思路，新招数。什么样的新思路、新招数呢？文章没有具体讲明。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在当时是发聋振聩的原则性新思路：市场经济。

文章受到指责的是这样一段：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 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资本主义有计划 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 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 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 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 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 在利用外资问题上 谨小慎

微 顾虑重重 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 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 不敢坚持和完善 甚至动摇 走回头路 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 工作松懈 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 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 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 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 就缺乏生气 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这里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 不再像上一篇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用‘商品经济’作代名词，而是理直气壮直接提出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是邓小平的讲话内容 但这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下文详表。

另外，这篇文章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文章认为每个单位能不能搞好工作，要看它是不是解放思想，深入改革。

文章继续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这“新的思想僵滞”除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形成了障碍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这就要看下一篇文章了。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三篇署名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这也是受攻击最厉害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要害在这一段：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一个与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80年代上海的开放 虽然成绩很大 但是步子还不够快 胆子还不够大 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直接关系，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 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 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 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 敢于冒点风险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 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 设立保税区 实行进出自由 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 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 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 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 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 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 那也只能越超不前 难以办成大事。

“新的思想僵滞”主要所指 终于在这篇文章中出现 这就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这的确击中了要害。

上文已经表明，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正是利用“问一问姓‘社’姓‘资’”来制造思想混乱，干扰改革开放 使 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陷入惶惶然之中。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有的地方甚至

现了倒退。

有些地区借口壮大集体经济，又要收回承包给农民的土地。《农民日报》为此刊登一些农民来信发出的疑问：“是不是党的政策又要变了，又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

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第四篇重要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文章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文章说，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实际贡献。”

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 提出要大量选拔“明白人”就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

文章提出：“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首先要大胆。”改革开放要大胆 使用干部也要大胆。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解放思想，克服障碍，勇于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 大力培养、大胆使用优秀人才。”

“其次是要广泛 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至于第三方面 文章认为：“选准选好干部还要发扬民主。‘要打破那种‘说你行 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 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的独断专行的选人方式 发扬民主 走群众路线，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 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这样 皇甫平写的四篇文章 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 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 到如何选人用人 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

皇甫平这些文章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

我们看看皇甫平文章所引起的令人震惊的反弹。

四、1991：“两问”围剿皇甫平之一

某些人明明知道皇甫平的文章传达了邓小平 1991 年春节在上海的讲话，可他们仍然在报刊上公开对之大加挞伐。这就使这一场斗争具有了极大的尖锐性……

针对皇甫平的文章，北京一些报刊紧密配合，默契一致，发表了密集连珠炮似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文章，帽子满天飞。

这种情形 多少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一般 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人明明知道皇甫平的文章传达了邓小平 1991 年春节在上海的讲话，可他们仍然在报刊上公开对之大加挞伐。这就使这一场斗争具有了极大的尖锐性，因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某杂志，1991 年第 2 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 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 叫作不问姓‘社’姓‘资’。”

“结果呢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 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 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 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不问姓‘社’姓‘资’ 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某杂志 1991 年第 7 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 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一路人 并且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

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 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 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改革不问姓‘社’姓‘资’ 其前途是危险的。”

“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 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某大报 1991 年 8 月 7 日以显著的大篇幅转载某杂志同年第 3 期的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文章把要不要问姓‘社’姓‘资’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 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 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 究竟该不该问 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 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 借改革之名 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 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 而是一种实际行动 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 人们也不妨问一问 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 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某杂志 1991 年第 16 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文 某报 8 月 13 日转载。这篇文章 尽管语句费解 但它的针对性是十分鲜明的。

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 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避免重大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 在前不久有的论者提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以后 又有论者提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这是否定对‘姓社姓资’的‘无理诘难’。”

“不问者 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 其实际效果只能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

8 月 20 日出版的某杂志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 竟说不让问姓‘社’姓‘资’就是‘压制群众’。可能是作者心里有点虚 于是把群众拉来壮胆。

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改革的新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是新还是旧 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 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 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 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长此以往 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 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1991 年 9 月 2 日 北京某大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一文。

这篇文章 首先表示自己不反对改革这两个字。文章说：“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在我们党内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都已历史地得到基本的解决。但是你真的要改革吗？对不起，没那么容易。”

文章说：“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

“我们的同志中 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 忌言‘姓资姓社’。更有甚者 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经批判邓小平的所谓‘唯生产力论’ 说邓小平只注重生产力发展 忽视甚至抛弃阶级斗争。张、姚并且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货色，是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某杂志 1991 年第 10 期发表了《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一文。

文章说：“这里所说的庸俗生产力观点 即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指的是那种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社会意识、精神的反作用，

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简单地、庸俗地夸大为生产力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意义上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物质利益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经济搞好了 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 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为了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只有向钱看 才能向前看’之类说法 就从不同方面 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 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 考茨基等人所宣扬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翻版 只不过有点新特点而已。”

“这样一来，势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混乱，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物质利益的追求 甚至使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经济社会主义’使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趋同成‘社会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面临畸形发展和变质的危险。”

无须多说，读者也会明白，这些话，是针对邓小平提倡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以及他多次阐述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而来的。

某杂志警告它的读者说 不问姓‘社’姓‘资’是“十分危险的”。这是该杂志 1991 年第 22 期刊登的《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班工作》一文中说的。

干部培训应该注意什么呢？这篇文章提醒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 这是十分危险的。”

还有一篇文章对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极为恼怒，要求批判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篇文章是由某杂志 1991 年第 6 期发表的 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 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 清理精神污染也好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 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 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 怎么做都行 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观点。”

文章问：“这个阴魂 指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不是 1989 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姓社姓资行吗？你姓资的那一套怎么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怎么行？”

.....

引了这么多文章 看似浪费篇幅 实则不然。

排列下来读下去 会收到一种自然而然的效应。这就是 你会对‘左’的思想方法，“左”的话语，“左”的攻击点 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从而有利于今后的“预警”有利于今后的识别。所以 看似浪费篇幅 实际上是有益的。

其次，只引一两条，你就会觉得作者在上文所说的密集的、连珠炮般的以及罕见的等等，是一种夸大。现在你一口气读下来，会对当时中国政治氛围有着一种更接近实际

的认识。

复次，引这么多，当然也有留此存照之意。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极为宝贵的资讯。

五、1991：‘两问’围剿皇甫平之二

如果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只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就可以解决，那真是太方便了。大家问就是了。没有经过尝试，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 这是脱离实际 不问客观情况发展 死抱着僵硬教条的理论。这种“问一问”的惟一作用 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如果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就可以解决 那真是太方便了。大家问就是了。

没有经过尝试 没有经过实践 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

这是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发展，死抱着僵硬教条的理论。

而且“问一问”是问谁呢 问实践吗 不是。这是理论家们不同意的。问了张三李四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的，行吗？也不行。我们的理论家也是不同意的。只有问他们，请他们来裁决才算数。这就不仅仅是主观主义的僵硬了，而且有点武断霸道的色彩。

这种“问一问”的惟一作用 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 从改革开放一开始 极左思潮就在不断地问 不断地答。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突破的。在那个时候，有人就问过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答案是 这是单干 是倒退 姓“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生气勃勃 也有人问过它姓“社”姓“资”。答案是 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 姓“资”。

建立特区 有人问过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 在特区里 只有那面飘扬的旗子是红的 其他都是“白”的。姓“资”！

浙江温州、福建石狮个体私有经济起步早 发展快 名声大。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 那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国有经济 姓“资”。

城市企业改革搞厂长负责制 有人问过姓“社”姓“资” 答案是 这是削弱党的领导，姓“资”。

鼓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 是姓‘社’还是姓‘资’? 答案是 这是私有化潜行，破坏社会主义基础 姓‘资’。

多利用一点外资 姓‘社’还是姓‘资’? 答案是 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 三资企业多了 就是资本主义多了 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姓‘资’。

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 比如海南洋浦)姓‘社’姓‘资’? 答案是 这是出卖国家主权 丧权辱国 这不仅是姓‘资’ 简直是卖国 是卖国贼!

市场经济姓‘社’姓‘资’? 答案是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 姓‘资’。

.....

改革开放以来最实质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于逃脱姓“资”的厄运。

问一问姓‘社’姓‘资’ 实质上是否定改革。

事实已经证明 极左思潮屡问屡答 屡答屡错。

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中国也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一步一步摆脱了贫穷，一步一步走向富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思潮只能导致中国的贫穷、愚昧与落后。

六、1991“：两问”围剿皇甫平之三

坚持‘左’的一套的人明明知道 从 1979 年到 1990 年 邓小平先后 10 次在讲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左’的文章仍然开足马力 猛烈批判市场经济。1990 年 12 月 17 日 某大报发表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 就是取消公有制 这就是说 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搞资本主义。”

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左”的代表性观点 除了“问一问姓‘社’姓‘资’”之外 再一个 就是维护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 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坚持‘左’的一套的人 明明知道 从 1979 年到 1990 年 邓小平先后 10 次在讲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一次 :1979 年 11 月 26 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龚育之同志考证，这是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